

■新作聚焦

# 陈彦《人间广厦》： 解剖民生难点与时代痛点

□白 烨

自长篇小说《主角》之后，作家陈彦于2023年创作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2025年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人间广厦》，两部作品均属血肉饱满又内蕴丰厚的力作。这种追求更好、再立新功的劲头，着实令人为之惊喜与敬佩。

作品写得又快又好，最重要的是生活积累丰厚而扎实，艺术开掘深刻而独到。这种优势与特点，在新作《人间广厦》里，体现得格外充分和鲜明。自20世纪90年代起，陈彦任职于陕西戏曲研究院，深耕于戏曲创作与研究领域。这既使他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戏剧领域的生活素材，又使他练就了由戏剧角度看取人生的独特视角。这两种要素的内在融合，成就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出奇制胜和后来居上。长篇小说《人间广厦》依然是他熟悉的生活领域和擅长的艺术表现的有机结合，因涉及“分房”难题，触及民生难点和时代痛点，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人间广厦》着力描写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是由戏曲研究所、民俗文艺研究所、美术书法印社、西秦腔传习所和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五个单位组成的。新建的30层住宅楼有98套房，按当时摸底的情况，不仅能解决尚不达标的住户的住房问题，而且还能“多出几十套来”。但新房建好之后引发了“离婚潮”，似乎人人都成了缺房户。“房子盖了三年，分了三年，愣是分不下去。”院长满庭芳临近退休，如何了却分房要事，就成了院里的难题，也成了他的心病。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纠纷，看上去是一出“闹剧”，但当涉及的问题一暴露出来之后，便显示出其深层蕴藏的悲剧意味。这既是西京文研院的难题，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难题。

## 利益博弈中的人性袒露

《人间广厦》可从多种角度解读出诸多意蕴，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是利益博弈中的人性袒露。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刚开始，就接连有人寻衅闹事。福利分房，难在分配的公平和要求的合理。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大战，显露出来的是利益诉求背后的人性弱点。马彪、拿五一等是以“闹”的方式寻求更大利益，陈霸先等人是以“逼”的方式彰显个人私欲，这些是利己主义作祟；应天长等人为本部门分配倾斜争执不休，其固守的本位主义立场也展露无遗。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平常风平浪静，“分房”之时波澜骤起，人人必欲得其所愿。

“分房”之事越闹越大，但总要以“乱”到“治”，有个了结。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了院长满庭芳的领导能力和工会主席杜觉喜的执行能力。满庭芳一方面分头找其他院领导谈话，一方面与老同志、年轻人对话，了解民情，倾听意见，讲明道理，尽力沟通，使紧张的状态趋于缓和，营造出了相对平稳的环境氛围。院分房小组在杜觉喜的主导之下，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在第一届的基础上，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终于拿出来给五个人适当加分的第二榜，使纷乱的局面有了稳定的趋向。但到公布第三榜时，却出现了许多意外状况。认为自己在申办建房手续时立功的陈霸先，因为没有得到加分待遇，一气之下得了心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在此期间，一直惦记分房也快要分到房的小桃红，在指导排戏时因过劳瘫倒，随后殁于自己家里。而一直等待分房结果的喜春来，因肺癌发作抢救未果，也不幸辞世。至此，由于多人意外离世的突发事件，使得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分房的结局，显得格外悲凉。这种异常的内耗和沉重的代价，不仅令人痛心，更发人深省。

## 陋室中的艺术坚守

我们还可以从《人间广厦》中解读出陋室中的艺术坚守。作为省级文化艺术研究机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



院多年来延揽了不少各个艺术门类的优秀人才。作品借助“分房”一事，通过满庭芳院长的登门拜访、同事之间的业务交流，以及这些艺术家们的各有千秋的业务专长和日常作为，细腻地表现了他们在逼仄局促的居住环境中的坚毅追求和默默坚守。他们那种安贫乐道的态度和淡泊名利的精神，既令人为之动容，也让人肃然起敬。这样一些不时映入眼帘的人物与故事，使得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在“分房”的闹剧之下，依然显露出了艺术研究机构应有的分量与光芒。整部作品也因此达成了闹中取静、邪中见正的平衡，在结构与氛围上更显沉稳。

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柴达木是民俗学专家，全身心都扑在民俗学研究上，涉及的范围包括老宅子、老祠堂、老家谱、老磨坊，还有拴马柱、门墩石、坎儿井、土尿盂，等等。办公室里“堆满书籍和资料，还有一些复印资料、拓片和残缺的老物件”。家里更像是一个民俗博物馆，“石刻、木雕、泥塑、饅梁、土坯、砖瓦，什么都有。有的在房顶倒吊着，有的在墙壁上悬挂着，还有的，在博古架上宛如絮卵”。他告诉满庭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开个民俗博物馆，把这些东西都展出去，留给后世。”

毕业于大学音乐系的贺新郎，一边演唱民歌，一边进行民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满庭芳走进贺家的一室一厅，“一种悲凉感顿时涌上心头。房里除了一些散乱的曲谱，让人感到与一个音乐家有点关系外，几乎与贫民窟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却在三面墙的木架上，“堆满了国内外经典名曲”“还有自己录制的盒带”。他的目标是“搞个音乐会”，整理改编关中与陕南的民歌，争取像王洛宾那样，“把天气地气人气全接通”。一直被看不起喜春来，从古建探幽转到花馍艺术研究。在他看来，花馍艺术“首先牵扯到粮食问题，涉及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及一系列文化传统问题，包括民族交流融合问题”，他与妻子豆叶黄合作，创作和制作了许多民间花馍艺术作品，其精心创作的《龙门石窟》艺术之作，已被国家级非遗文化艺术展馆收藏。还有一直很在意分房结果的小桃红，在西秦腔传习所要排演《玉堂春》等剧目时，“像焕发了青春一样”，全身心扑在为年轻演员说戏的艺术指导上，在做动作示范时瘫倒在地上。她因为不求名利，没有任何职称，但却在工作上比谁都称职，弥留之际还惦记着秦腔艺术的传习。

艺术家们对待工作的认真专注、对待事业的全情投入，与他们应得的待遇、应有的住所，是完全不成正比的。这种显见的反差，既充分彰显了艺术家们的施不

## 长篇小说《人间广厦》着力描写

20世纪90年代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难题，看似是一出“闹剧”，实际上是一个时代普遍民生难题的典型化概括与文学性重述。除了利益博弈中的人性袒露，小说更细腻表现了艺术家们在逼仄居住环境中的追求和坚守。人们会在历史回望中反观当下，深刻体认时代演进与社会进步的脉络，更珍惜日新月异的新世纪和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 民生难题与时代之痛

第三种解读的视角是民生难题与时代之痛。《人间广厦》大致是以20世纪90年代为背景，描写还在实行住房实物分配时期所发生的生活故事。那个时期的情形，我们都见证过；福利分房之难，我们也都经历过。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分房”纷争，实际上是一个时代普遍民生难题的典型化概括与文学性重述。可以说，《人间广厦》是以艺术写真的方式，讲述了我们大家共有的故事，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地重温了曾有过的经历，设身处地地领受了曾体验到的种种难与苦。

《人间广厦》所描述的故事，已经是“过去时”的现象。但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上世纪90年代，因为刚刚开始探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计划”还在起着较大的作用，“市场”尚在培育发展过程之中，整个国家正处于逐步转型的痛苦过程之中。体现在民生领域的住房方面，主要实行的还是国家或单位通过分配公有住宅解决职工住房需求，少有其他途径。但因住宅供不应求，僧多粥少，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和合理，也很难达到人人称心和如意。而且那一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物资匮乏和资源短缺，人们也常常感到精神上的无力和苦闷。《人间广厦》描写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故事，由“分房”所展开的争夺与争斗，反映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状与民生现实。这部作品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处境与精神焦虑，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与社会的症结和痛点之所在。同时，人们也会在历史回望中反观当下，更深刻地体认时代演进与社会进步的脉络，从而更加珍惜日新月异的新世纪和波澜壮阔的新时代。这是《人间广厦》一作没有实写，却又隐含了的重要意蕴。

不忘过去，珍重现在，寄望未来，这是人们在《人间广厦》的阅读之中所能获得的多重感受和诸多启悟，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与深远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创作谈

这部小说开始一直叫《分房》。

我想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已经很久了，甚至在《装台》与《主角》之前。我对写熟悉的生活，一直抱有坚定的信念，只有那个靠得住些。咀嚼过的生活，方便省察，也容易理出头绪来。尤其是亲身经历过的，有时还会在梦中重演，惊出一身冷汗。即使梦醒，也还是久久不能释然，还在想着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能否重新来过。可一切已是涛走云散，物是人非。我只能在小说中寻找一种重构，让真人真事隐去，全然依小说的逻辑，去编织故事。

然而，生活终是作家的营养钵。我所参与过的无数次分房，以及别人讲的哪怕是北上广、长三角、珠三角的分房故事，也有大致相同的根茎，都是一种资源性分配。共有资源转化为个人福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分房只是其中之一种，且是发生在一部分从事社会管理、公共事业与企业价值创造劳动者群体中的一种分配方式。还有更广泛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等需要分配。合理分配始终是重要的社会演进衡器。分房的小说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只是力图以这个生活微光，去窥探一些事物与生命的颤抖与律动。让更需要、更应该拥有的人拥有，始终是社会摸索前进的主航道与路标。

这部小说由《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不仅是为了跳脱就事论事的直白言说。写着写着，就不是一个单位分房的事了。尽管写作的起意，也不是为了一个不曾有过的单位的简单分房事体。那就是一个大江串，仍是浙江的嘴、北京的脸、山西的衣服“拼凑起来的”。鲁迅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个说法十分合乎由生活到艺术的构成逻辑。《人间广厦》本身也是对一个微观单位分房事情的延展，让它尽量辐射到城市、乡村的不同角落，甚至进入历史的“掩埋”深层，去看有关生命安居与精神栖息的不同维度、面向，从而也为沉闷的人生现实的物欲、物役、物累、物困，打开一点减压的阀门。

人类从穴居，到竹林茅舍、绳枢瓮牖、瓦屋橡梁，再到高楼大厦、豪宅别院，是经历了万年以上演进过程的。由遮风挡雨，到宽敞舒适，再到追求审美意趣，是一部可以详查的物质与精神演进史。未来，星际殖民、太空都市，以及真正可以海空两栖的诺亚方舟矩阵，似乎也不再是过于遥远的神话。但科学再发展、技术再进步，人类如何诗意地栖居，仍是一个问题。我想，即使未来移居到火星上，房大了窗小了，向阳了背阴了，景色明丽了还是晦暗了，依然还会引发争夺之心。因此，《人间广厦》说到底就不是一个绝然分房的事。它会像创土豆一样，创出一兜羹一兜羹的冰山吃水线以下的人性善恶与不期而遇来。

小说中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单位，因“文化艺术研究”六个字，而将不同的单位“捆绑”在了一起。这的确很大的一个院子，属废弃的钢铁厂，研究院也仅仅只占了一角。我曾见过很多类似的厂房，都做了艺术用途，要么是画家村，要么是影视拍摄基地。而将这样一个院子给了一个文化单位，足有十几亩地，从地皮上讲，确实有些阔绰而奢华。最关键的是，他们能在院里建一栋“成本价”住宅楼，这也是文化人乐于从城市中心“腾龙换鸟”出来的原因。可自打新建楼起，院子里人的生活就没安宁过。这部小说就从分房的“最后总攻时刻”开始，炮火连天地写到曲终人散。

与此同时，院落的其他建设也在进行中。在这部小说里，我完成了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把我生活的地方，无论是村庄还是单位，抑或别墅、别院，搞成一个有自己爱好与独特审美力的模样。可我与儿时的村庄已离得很远，也始终没有别院可供自主打理。为《人间广厦》的书写，我一次次把眼睛盯在从都市到乡村的各种房屋建筑上，连农村新起的一排排水泥墩子式“洋楼”，显现在稻田与麦田的边缘，我觉得也似乎有某种不大协调的难堪。墙上再贴满“福”“禄”“财”“寿”的大红大绿瓷片，似乎离数千年前贺兰山民与阴山山民的想象力，也是差了些成色。村落、小镇、都市的脸面，房子永远是主导，人间广厦的审美性，也就由分房缘起，不断被袂飘动在小说的缝隙里了。

小说中特别写到几位民间文艺家的生存现状，他们或多或少是有原型的。他们始终在打捞、张扬底层民间文化，有些是即将消失的残存，有些是当下的“特产”。在小说主人公满庭芳看来，今天的文化着力，恰恰是缺失了民间的维度。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单位管理者，在“分房”这场大戏中，也对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学术现状、水准、着力点，有了深切“分房”弊端般的审视与省察。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也在人性冷漠、苛刻与温暖、包容中一再水盆显影。规矩、原则都很重要，但人性的温度永远应该与它们相向而行。一切好的运作一旦失去人性加持，怕都是难以为继的。

人间的一切大争，在时间的磨道里，终将灰飞烟灭，过不去的是现实，是当下。而现实与当下又是生命最灿烂的花章，人间的痛苦便在这里一次次咬出痛不欲生的深刻牙印来。

# 嫁衣作军衣 军民鱼水情

——评铁流短篇小说《红棉袄 蓝包袱》

□丛新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文学中涌现了诸多革命题材创作，以其真实的历史画面和丰富的人性内涵进入“红色经典”序列，为文学史画廊贡献了一个个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立足新时代发展语境，如何表现其题中应有之义的革命文化是一个难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铁流的短篇小说新作《红棉袄蓝包袱》作出了有益尝试。

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解放军某营驻扎山村，卫生员栓柱入住李大叔家，李大婶和李朵朵母女倾其所有进行接待。朵朵先是让母亲点亮灯芯来照明，又和母亲一道劝说栓柱吃炒鸡蛋，交谈得热烈而明快。为了治疗战士们的疥疮，栓柱用花生油代替猪油制作药膏，却不小心洒在自己的黄棉袄上。于是就引出了围绕“红棉袄”“蓝包袱”而发生的人际关系。用蓝包袱包着的红棉袄本是朵朵的嫁衣裳，现在穿在了栓柱的身上，恰是军民鱼水情的深厚表达。母女细心地把红棉袄中的棉花拆出来填充到栓柱的黄棉袄中。就是这样的不声不响的举动，让人感慨万千，真正无私的大爱也流露其间。最为珍惜的嫁衣，巧妙地成为子弟兵的军衣。

执行任务返回的栓柱，发现朵朵家被烧抢。他在奋勇救火中遭遇枪击受伤，于是继续留在朵朵家养伤以待康复后归队。在此前后，朵朵的未婚夫孙大宝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生死未卜。国民党军队不断前

来骚扰。为了掩护栓柱，朵朵以假乱真，顺势声称栓柱是自己的丈夫，让栓柱的心灵再一次深受触动。期间传来了孙大宝因逃跑被国民党打死的消息，让李家陷入两难的困境。于是在众人的撮合之下，朵朵与栓柱喜结良缘，新的生活仿佛开启了新的篇章。

鲁南战役日渐临近，朵朵一针一线缝制布鞋，又用那件蓝包袱包裹好后放进栓柱的行囊。在战场上，栓柱救护伤员，巧遇被误传死讯的孙大宝，原来他逃离国民党军队参加了解放军。正当栓柱不知如何面对之时，正好遭遇敌机轰炸，栓柱立即趴在大宝身上，以自己的牺牲护住了大宝的生命，并在临终前托付大宝把蓝包袱交给朵朵。面对包过红棉袄又包过那双完好无损的布鞋的蓝包袱，朵朵双膝一软跪倒在雪地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呼应达到高峰。

在并不复杂的情节和平静如水的叙事之中，《红棉袄 蓝包袱》这篇小说写出了波澜起伏的情感动态。从朵朵泼辣大方的出场、朴素勇敢的应对、细腻微妙的心到栓柱的肺腑内向的接受、知恩图报的付出、舍弃自我成全他人的牺牲，都得到了淋漓尽致表现。这样的故事和情感、人情和人性，让我们重回历史发生的现场，回归内心世界的本真，重温感人肺腑的力量。那个时代过去了，但那种精神却永远地留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评 论

# 小说家的真诚告白与精神档案

——评《刘建东自选集——远离海的故乡》

□杪 楞

《刘建东自选集——远离海的故乡》收录的散文大致有行旅记录、回忆故乡和亲情的作品、与文学有关的阅读和创作手记、对话等。借由作者以散文的形式对内心世界的细腻表达，我读出一位以“虚构”为业的小说家，面对真实世界时的坦诚与情思。

散文擅长的是抒情和说理，但情理必然要有所依凭，否则“意”无“象”可附，意义的楼阁就会坍塌。因此，散文必须是“及物”的。刘建东的散文视野开阔、格局疏朗，但也给人坚实的在地感。他对生活和事物生发出的感受与哲思，是伴随着书写对象由“物象”变为“意象”而实现的，是“见景生情”和“借景抒情”这些朴素审美原理的具象化。在这个过程中，他善于做细致深入的观察和描摹，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地呈现自己的发现和感悟——这当中不乏独特的视角。在《向上攀登的树》中，看见长白山的岳桦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贫瘠土壤扎根，在接近2100米时“向背风处弯腰，却枝干坚硬如剑”。岳桦成为“生命韧性”的象征，弯曲不是妥协，而是“以战斗姿态抵御风雪”；矮小不是怯懦，而是“用牺牲祭奠不屈”。作者由此想到“攀登的过程本身就是风景”，将自然物象升华为对生命价值的思

考，即真正的崇高不在于抵达顶峰，而在于永不停歇的向上。同样的笔法也体现在《胡杨》和《为了盛开的等待》等篇章中。这些文字里的物象虽然是起点，但作者以“看山不是山”的洞察力，让每一株草木的起伏都成为叩问生命的问答。

在行文中激发灵感，写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刘建东的散文表现出鲜明的在场感。作者不受所见之物羁绊，将神思放逐在更灵动和广阔的想象空间中，以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抵达散文的文体特质。这种自由的特质突出表现在几篇踏访历史遗迹的作品中，《寻苏轼八观》是去凤翔后所作，作者循着苏轼的足迹探访石鼓、沮楚文碑，探访苏轼“掘泉疏池”而建的东湖。作者站在冬日的东湖，看到的是“枯黄的树叶漂浮湖面，酒糟香气弥漫”，历史的场景与现实的景象发生了重叠，“穿越时空见古人”的感慨油然而生。《天龙山回声》这一篇更具痛感和温度，作者面对残缺的天龙山石窟，面对佛首被盜后“粗糙醒目，透着不甘”的凹面，想起1920年代文物被盜的历史。参观漂泊近百年的佛首回归展厅，又有一种“文明回家”的欣慰，勾连起人们对文化遗产命运的牵挂。

散文虽然讲求“篇篇有我”，但对作者而

言，以自我为“客体”的作品有着不可替代性。囿于自己专业作家的身份，从书写对故乡的眷恋到与朋友的交往等，都会追溯到自己的文学之路。《父亲是一本慌张之书》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回忆父亲对自己无言的期许，这些细节不是简单的往事回忆，而是作者对自己“文学起点”的确认——自己身上的文学种子，早就在父亲“慌张的期待”中萌芽了。在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这份感悟让父爱超越个人体验，让每一个在期待中成长的读者感动。《远离海的故乡》与《亲爱的朋友虎良灿》分别书写了故乡与友情的心灵印记，这些真诚的文字中有亲情和友情的温暖，也有对生命和成长的困惑，它们都是作者与自我和世界沟通的方式。

一篇散文最重要的内容，是寻到“散文的心”，有了“心”，方能求散文的体。这部散文集不仅融入了个人化的叙事视角和语言质感，也像小说创作那样追求叙事性和结构的完整性，有一种凝重和庄严的气韵。这些散文作品是刘建东精神世界的“档案”，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写作者如何在生活中与世界和自我对话，从私人记忆里结晶出跨越个体的共情。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研究员）